

果然不出所料,没过多久,一位笑容严肃的中年男子过来,介绍他是县政府办公室主任陈平原,请锣鼓队的领导们进去说话,也请敲锣打鼓的大伙儿稍微歇歇,路边坐坐。雷东宝一个眼色,叫上大队长,两人一起进去。外面的锣鼓暂时歇了。土根这才松了口气,看来谁都吃马屁,雷东宝到底是当过兵见多识广的,没错,又是他白操心一场。

雷东宝被办公室主任陈平原弓进徐县长办公室,看到起身迎接过来的徐县长,心里不由一沉,这不是门口那个令他心虚的年轻男子吗?雷东宝预感自己的诡计可能无法实现了。大队长不知就里,见终于如愿见到县长,非常欣喜。两人的表情自是收入徐县长的眼底。

县长办公室非常简单,桌子椅子文件柜之外,就是屋底有张窄窄的木板床,床上铺着蓝白方块相间干净的床单。徐县长招呼大伙儿坐下,早有人上来端水倒茶。徐县长自己端把椅子,坐到雷东宝他们两人面前,依然是微笑着道:“你们雷书记没来?”

队长立刻道:“老雷年纪大,身体不舒服,那么多路走着累,我们过来也一样。”

徐县长还是微笑着:“看到你们过上富裕生活,我们都很高兴。贫穷不是社会主义,让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大干快上,奔向四个现代化,过上富裕日子,才是正确的社会主义道路。如今你们的富谷生活,一是靠党的好政策,二是靠你们自己坚持不懈的努力,是你们小雷家大队群众鼓足干劲,同心同德,力争上游,才有今天的新手扶拖拉机和新自行车。你们更应该感谢的是党的好政策和你们自己。我代表县委、县政府,向你们两位工作在四化建设第一线的基层领导干部致谢。”

队长和雷东宝忙要站起来,被徐县长起身按住。雷东宝在心中盘算,县团级,县团级,县长起码是军队里的团长级别啊。他本来话就少,县长这样有觉悟的话更说不出来,对于县长的致谢他只会笑,还是队长撑场面,连说“谢谢县长表扬,谢谢县长表扬”。

徐县长摆手阻止队长的道歉,微笑着道:“我想了解一下小雷家大队究竟推行了什么政策,能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取得成就。”边说,他边起身,关上,“不限时间,大家畅所欲言。”

雷东宝这才开口说话。在徐县长的微笑鼓励之下,他没一点夸张,也没一点削减,如实向县长汇报了年前的承包,年后的砖窑。因为都是他一手做下来的事,所有的数据他都是信手拈来,诸如每个社员平均承包多少土地,土地怎么公平分配,社员如何自愿组合,春收小麦实际亩产最高多少最低多少。然后是砖厂的工作,每月产量多少,废品率多少,利润多少,上交大队多少,砖厂留成多少,砖厂职工如何计件,等等。他一边说,徐县长一边在笔记本上简单做着记录,都是非常认真。

雷东宝说完,徐县长拿笔在笔记本上稍作计算,才问:“购买手扶拖拉机的支出,是贷款的吧?”

雷东宝答应:“是,向信用社贷款的。一年后拿砖厂留成来还,应该够还。”不知不觉,雷东宝在回答中用了当兵时候粗着喉咙回答首长问题的劲气,一个人的大嗓门在县长小办公室里震出“嗡嗡”回响。

徐县长再看一遍笔记本,不由惊叹,中央还刚在小范围试点工厂全员承包,小雷家的砖厂却更进一步,已经推行计件,而他们大队土地的承包,更有安徽推行的大包干的雏形。(15)

尽管心乱如麻,我还是坐上了前往马拉加的公交车,继续我的旅程。在一个换乘车站,我等待着开往拉利内阿镇的公交车,那将是我前往直布罗陀之前的最后一站。一个年轻男子上前询问我是否愿意接受训练成为一名西班牙舞者,他说我的长相和身材都非常棒。我似乎被打动了,正在此时,公交车进站了,我随即登上了汽车。现在回想当时的场景,如果当时的班车晚到几分钟,也许我的故事就彻底改变了。

回到马德里,听西尔维娅说,皮拉尔对租客越来越不满,她甚至要求西尔维娅搬出去,以至于西尔维娅不得不住在了我的房间。我并不介意西尔维娅的加入,不过,我很快就要离开了。

趁刘易斯在家举办派对,西尔维娅和我一起讲了皮拉尔的事情。我们告诉刘易斯,住在那间公寓会时常受到一些男性骚扰,这显然是皮拉尔疏于管理所致。晚上回家时,有老男人试图纠缠我们,好在我们发出呼叫声时门卫能及时出现。有时上锁的卧室门把手会发出“咯咯”声,令人心惊肉跳……

听着这些故事,刘易斯的妻子吃惊得差点将开胃酒喷了出来,我们见了乐得合不拢嘴。于是当地的朋友们被紧急召集起来帮助西尔维娅找新住处。刘易斯的许多熟人都在英国使馆工作,他们都很有趣,也很谦虚,外交工作就是这时出现在我的兴趣名单上的。

第二天我乘坐飞机赶回英国,心里交织着复杂的情绪:一方面为离开这个美丽奇异的国度感到惆怅,一方面又为即将在我面前铺开的精彩未来感到迫不及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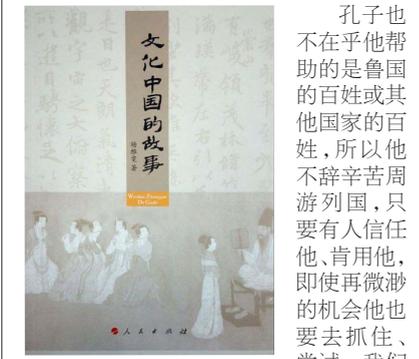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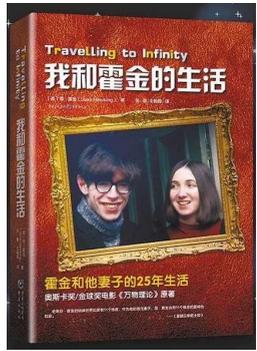
不确定的原则
从西班牙回到英国后我就试着联系史蒂芬,但这样的努力似乎没有任何成果。听他母亲说,他已经回到了剑桥,而且身体状况非常糟糕。我自己也忙着离开家,前往伦敦开辟我人生的新篇章,接下来的

几周以及接下来的秋天,韦斯特菲尔德学院和伦敦彻底占据了我所有的时间和精力。音乐会、戏剧、芭蕾舞占了我的全部时间。

一天,我和朋友们乘坐在伦敦的地铁上,我们看到报纸上刊登了美国肯尼迪总统被暗杀的消息。差不多同时,1963年11月,我再次得到了史蒂芬的消息。他将来伦敦看牙医,他邀请我一起去看歌剧。这当然比那些迎新舞会更加值得期待。

一个星期五的下午,我在哈雷街与史蒂芬碰面。他的舅舅拉塞尔·科尔在这里开了间牙医诊所。史蒂芬走路不稳,如果我们要去远一点的地方,不得不花钱乘坐出租车。奇怪的是,他的步态越来越蹒跚,观念却越来越特立独行。我们一起去参观了距哈雷街不远的华勒斯典藏馆后,又准备去摄政街上找吃的。走到十字路口时,史蒂芬摔倒了。在路人的帮助下我把他扶了起来,然后我就一直搀扶着他,他浑身都在发抖。我们叫了一辆出租车,前往萨德勒威尔斯剧院。

我们看的是《漂泊的荷兰人》。故事中的荷兰船长受到魔鬼的诅咒,必须在海上漂泊,直到一个真心爱他并愿意为他付出生命的女子的出现。我意识到史蒂芬或许认为自己与那位荷兰船长有相似之处,我似乎也可以理解他那种不要命的开车模式。那辆轿车就是他的“飞翔的荷兰人”号。他同样也在搜寻着解救和出口,然而却没人可以给出答案。(8)



不要以现代驴友一个背包走天下的潇洒来看待周游列国这件事;在那个兵荒马乱,找水,找粮食,找住处都不容易的时代,有什么驴友?有的只是饥民、难民、流亡之民;真正的聪明人是像长沮、桀溺、楚狂这种隐者,找个乡间耕田种地,打仗时别被抓去,好生养活自己就行了,管他天下苍生水深火热!孔子30岁后在家里开班授课已远近驰名,过日子早不成问题,他却到了56岁还要自讨苦吃,离开心爱的妻子、儿子、孙子,苦行僧似的到处求用,被误会、怀疑、坐冷板凳也就算了,有时还被追杀。

中医称谓源自“中国的医学”难道是误解? 中医在古代也是一种技艺。我们今日讲养生,想到的一定是中医而不是西医。西医不讲养生的,顶多呼吁人们多运动、饮食正常。中医则更加强调防患于未然,“愚者闾成事,智者睹未形”,愚笨的人,灾难临头了还不知道;而有智慧的人,在事情还没形成之前就预知征兆。

为什么听脚步声、开门关门声就知道是谁来了

在中国传统文化里,人本身是个整体,任何外在的表达都是内在心境的体现,比如我们会说一个人“眼睛很有神”,“气色不太好”,或者“感觉带点阴气”,这些感觉无法量或具体描述,但确实存在。现代人受西方理性主义影响,一切都要量化才觉得踏实,即使是质,也必须是可量化的质,一幅画画得多好,得看它在拍卖会上喊出多少钱;一件衣服设计得多有质感,取决于吊牌上的标价,现代人眼里只有价格没有价值,对清风明月、花香鸟语这些免费的无价之宝却都熟视无睹了。

现代人的学习,往往急着向下一课、下

一曲、下一本书前进,不停地累积知识或技巧,却无法掌握到其中的纲领脉络,更遑论其中蕴含的精神人格;孔子一心向琴曲深处追寻,从旋律到技巧,再到精神、人格,这方才是“学”的真义;而他最后得文王之为人,甚且形容出文王的样子,这与上文谭家哲先生摆棋谱时望见京都石园的经验,岂非异曲同工之妙!

这样的感悟并非空谷穹音,伯牙子期的高山流水,正是不藉言语而经琴音得以心意相通的例证,这就是“心领神会”。

明朝徐上瀛的《溪山琴况》里,将琴音分为和、静、清、远、古、澹、恬、逸、雅、丽、亮、采、洁、润、圆、坚、宏、细、溜、健、轻、重、迟、速二十四种,这二十四个字不但可以形容琴音,拿来形容人的气质、眼神、字迹、绘画,也是一体通用的。

日常生活中,熟悉的好友或家人间,也很容易在一个眼神或口气中了解彼此当下的所思所感,或者听脚步声、开门关门声,就知道是谁来了,这种细微的感受、生命的相通也是我们以自身经验便可以印证的。

庄子《庖丁解牛》故事里,庖丁解释自己分解牛的诀窍,在于“由道进乎技”,他一开始看到的是整头牛,三年后再也看不到牛的整体,而是肌理节膜,十九年来,已经练到“不以眼睛观看,而以心神相会”的境界。类似的经验也可在现代人的记录中看到,如德国哲学教授奥根·海瑞格(1884-1955年)。他为了真正了解文献中所记载的东方神秘体验,决定到日本学箭术,从拉弓、正确地呼吸学起,花了无尽的心血以达到在肌肉完全放松的情况下维持拉弓的饱满;然后学射箭,但射箭并不是练习如何瞄准轴心,而是要忘掉思虑标靶乃至射箭这件事,让内心保持一无所求的空明状态。

真正的射箭是箭自己射出去的,这种境界超越知识、技巧、感官、意识,而以绝对专注的心灵处于当下,这种“绝对专注”包括忘掉对手,忘掉手中拿的弓与箭,乃至忘掉“我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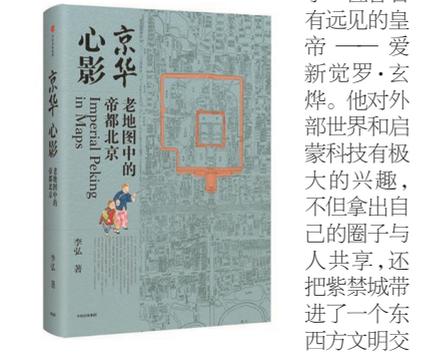
熬夜、喝酒为什么最伤肝 中医养生能给你答案

现代人喜欢熬夜工作、喝酒应酬,这样的人往往肝最容易出问题。为什么熬夜、喝酒最伤肝? 中国古人认为人体是个小宇宙,相应于天地的大宇宙,天地有日夜寒暑,人体也有它的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。体内气的运行随着十二时辰而不同,人体因而必须依循十二时辰做不同的事情。(10)

如果明代内城图真的是15世纪中期出现在北京,那么它怎么能在300年后流传到英国的皇家学会,在伦敦被印制刊行? 这件事的原委,还得从法王路易十四派到大清宫宫内传教的神父谈起。红墙围起来的皇圈里,当年行走着一批金发碧眼的洋人,他们对帝国舆图、京城地图的制作,以及京城文化在世界上的传播,起过不可小觑的作用。

大清的血统是东北的满族人,他们没有像前朝的皇帝那样对传教士充满戒心。尤其是在顺治、康熙、雍正、乾隆几朝,紫禁城对西方来的传教士,门始终是开着的,甚至把他们奉为上宾。这些在宫中行走的神父是从哪里来的呢? 他们都是来自一个圈子,即属于“神圣罗马帝国”的国家,包括意大利、德国、法国、奥地利、葡萄牙、西班牙、比利时等。从人数上说,最多的是法国人。你可能注意到了,这里面怎么没有英国人啊? 对的,没有。因为英王亨利八世在16世纪与罗马教皇打架,脱离了罗马教会的管辖,搞起了英国的圣公会,自己当上了英格兰国教会的最高领袖。耶稣会士都是罗马的虔诚信徒,到了中国翻译成天主教徒,他们当中自然看不到英国人的身影。当年的法国在路易十四的统治下,实力强大,野心勃勃,将信仰渗透到中国的劲头,超过了神圣罗马帝国其他任何王国。

在任何一个朝代,想混入皇帝的圈子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即便是中国人,既要科考殿试,又要买官觅爵,想方设法,也不一定成功,更不要说是语言不通的外国人。异教的法国人,能够大模大样地进入规矩深重的紫禁城,除了是因为他们靠着路易十四的背景,顶着“国王的数学家”的头衔,还有一个值得他们庆幸的空明状态,那就是此刻的大清出了一位睿智有远见的皇帝——爱新觉罗·玄烨。他对外部世界和启蒙科技有极大的兴趣,不但拿出自己的圈子与人共享,还把紫禁城带进了一个东西方文明交



汇的国际圈子。

有那么一段时间,法国神父和康熙皇帝走得最近,一起出行打猎南巡,征战西疆,还被请去住在紫禁城。这样的待遇要是发生在后世,肯定令人受宠若惊,喜不自胜,早就传到全地球无人不晓。但传教士千里迢迢来找皇帝,兴奋点并不在这里。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的时代起,下至汤若望、南怀仁,神父们为了宗教信仰这个伟大的事业,甘心在紫禁城里为皇上提供“义务劳动”,目的是曲线传教。如果能说服一统天下的皇帝先带头,皈依西方的天主,那对减轻传教士在天朝各地遇到的抵制与困难,无疑有着事半功倍的效用。

康熙把他父亲顺治皇帝的寝宫改成自己的教室,两位教授就在那里向皇上传授数学、天文、解剖、哲学知识。说到皇帝高兴处,大家常常是一坐几个小时

法国传教士里有两位神父,一位是来自勒芒的白晋(1656-1730),另一位是来自凡尔登的张诚(1654-1707),他们都有着殷实的家境,又受到过良好的教育。为了曲线传教,他们在康熙身边着实下了些功夫,为做好“非本职工作”尽心竭力。

例如,康熙把他父亲顺治皇帝的寝宫改成自己的教室,两位教授就在那里向皇上传授数学、天文、解剖、哲学知识。说到皇帝高兴处,大家常常是一坐几个小时。康熙允许他们不必拘泥君臣之礼,畅谈东西,话题涉及各国的政治经济、科学艺术、奇风异俗,还有法王路易十四治理国家的丰功伟绩。白晋在紫禁城里曾陪着康熙和孩子们一起游乐,听徐日升神父在殿前弹琴,还曾一起给皇太子上课。皇上不时冒出一些出格的想法,令神父们印象深刻。比如有一次,康熙生了病,神父们给他吃了西药奎宁病就好了。痊愈之后,皇上突然起了创意,要和神父们在紫禁城里联办药厂,制造奎宁。又有一次,他问神父风力怎样可以被利用? 第二天圣旨来了,皇上要在宫里开辟一块地方,请中西能人一起上阵,打造西式的大风车。久而久之,神父们可以进出皇帝居住的内室寝宫,观察皇帝睡房里的墙上挂了什么画,摆放了什么物品。在太和殿里,皇帝上朝,听大臣们就奏折进行辩论,传教士们也不需避让,他们可以穿着同样的朝服,站在皇上御座边上旁听。白晋说,有一次,一帮大臣被罚跪,康熙不高兴,他们就不敢起来,狼狈极了。(9)